

二十八年间

——从师政委到总书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杨国宇 陈斐琴 王传洪 编

军情似火

信任与力量

威严的山

谋深虑远

二出陇海线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

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早文

封面设计：陆震伟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

杨国宇 陈斐琴 王传洪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6 字数 184,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册

ISBN7-5321-0417-6/I·346 定价：5.10元



建国三十五周年纪念检阅，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

朱德（木刻）



鄧政治委員

李成興



隨八路軍渡黃河展開敵后抗日游擊戰爭。
左起：李成興、朱德、鄧小光。



在大别山

进军西南中，与刘伯承（左二）、李富春（左一）、张际存（左三）在作战室。





在西南军区第一届英模代表会议上讲话。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山摄）

二十八年间

(代前言)

十亿人口的神州大地上，正在掀起巨大的改革浪潮。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人们要求更多地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作为这场改革的主要领导人的邓小平，了解他的昨天和今天，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侧面。

邓小平从年轻时起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中，为中国人民做出过许多贡献。而他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无疑是因为他引导中国迅速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邓小平目光远大，意志坚强，反应敏锐，行动果断。他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魄力和威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邓小平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曾多次因坚持正确的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打击，却由此博得更多人的信赖和爱戴。现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把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步之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阵营内部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在敌后不断制造磨擦,袭击八路军的驻地,杀害八路军的干部,使八路军处于两面受攻的艰险地位。1939 年 12 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 年 3 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部和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同年 8 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 38 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 529 次,给了日、伪军很大打击,鼓

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年以后,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囚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有远见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作报告,对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短期回延安三次:1938年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1939年7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同卓琳结婚;1945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

人传为佳话。邓小平这样说过：“人民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个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想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在毛泽东指挥下，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这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具有决战意义的解放战争。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方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那时，邓小平正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有平汉、津浦、同蒲三条铁路纵贯其间，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道路，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

1945年9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深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队13个师、35000多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共消灭国民党军4万多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作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

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局势依然严重。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总兵力仍比人民解放军多出将近一倍,武器装备更占着明显的优势;他们气势汹汹地从山东和陕北之两翼发动重点进攻,力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况,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1947年6月底,刘邓率领12万大军,以突然的行动,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56000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出人意料地疾速南进。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30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以20多天行程,从几十万敌人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30多旅、约20万人。而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

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人周旋。他们采取分兵的办法,以纵队或旅为单位,分工包干,消灭敌人保安团队,从事地方工作;而当敌方重兵将要到达时,集中一部分主力,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创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被粉碎了。刘邓大军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 160 多个旅中的约 90 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发动,解放战争终于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1948 年 11 月,历时 65 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淮海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大门。济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收缩兵力,将他在

南线所能集中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徐州地区，先后共有 5 个兵团和 3 个绥靖区的部队 80 余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参战的有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7 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16 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 60 余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达 540 余万人。他们用小车、挑子、船只这些工具运送了 4 亿多斤粮食、1400 多万斤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其他成员是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毛泽东一系列重要决策，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每项作战计划决定后，邓小平又承担起大量的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工作。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个军突然在阵前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将它紧紧包围在碾庄地区。接着，总前委又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原野战军采取果断行动，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津浦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一举切断徐州同它后方之间的交通，使集结在徐州周围的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顿时陷于孤立，断绝了退路。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

共中央军委立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浍河和涡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经过20多天的激战，全歼了敌军的这个精锐兵团。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65天的分阶段作战，终于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歼敌555,000人的巨大战果。毛泽东后来称赞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从此，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南京门户洞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了。

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统率第二和第三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漫长战线上，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布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渡江作战前夕，邓小平又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踏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

制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解放西南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个兵团，分南北两路开进，迅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国境线长，民族关系复杂。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 90 多万军队，散兵游勇很多，土匪特务活动猖獗，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力量；谨慎妥善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成了各民族的团结；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

他们迅速着手恢复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作出了兴修成渝铁路的决定。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四川人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邓小平等还担负起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艰巨的工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1952年7月，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1954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

长、组织部长，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即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时他刚满52岁，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整整当了十年总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邓小平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从1956年9月到1966年5月的近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根据“八大”提出的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工作方面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左”的错误发展起来。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的措施，制定了应遵